

读《张迁碑》再志疑

程章灿

笔者曾撰《读〈张迁碑〉志疑》一文^①，围绕此碑的出土与流传、碑文的语词及用典、碑文中的官名及其碑额体例、碑文书法以及汉碑的伪刻与重刻等问题，经过较为系统的考辨，提出了自己对《张迁碑》的质疑。因为文章篇幅有限，有些问题未能充分展开，文章发表后，个人对这一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。今就以下诸问题再作探讨。

一、前人对《张迁碑》的怀疑

前所撰文曾谈到，顾炎武首先对《张迁碑》提出质疑。顾氏之后，仍有许多学者怀疑此碑，只是由于年代悬隔，现在已难以一一指证。乾隆年间的金石学者牛运震在《金石图说》卷一说：

《白石神君碑》、《张迁碑》，昔人皆以为伪也。或曰魏人翻旧碑为之，综其实，不然。^②

从牛运震的语气来看，怀疑《张迁碑》在乾隆之前是很普遍的看法，因此，牛运震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提出这些“昔人”的具体名字来。金石学者往往不免佞古，一件石刻初出土面世之时，通常还有人敢于提出质疑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质疑的声音就渐渐消沉下去^③。《张迁碑》即是如此。乾隆以后，随着《张迁碑》逐渐奠定了自身在汉碑和汉代书法艺术史上的经典地位，怀疑《张迁碑》的声

①程章灿：《读〈张迁碑〉志疑》，《文献》2008年第2期。

②《金石图说》卷一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2辑第2册，第974页。按民国金石学学者顾燮光也说：“前人以碑多借字，疑为伪作。”见顾燮光撰，王其祯校点：《梦碧簪石言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70页。

③邓之诚《骨董三记》卷五《晋辟雍碑》：“近年数出晋碑，有《左芬（茝）志》、《郭隗志》，笔法皆若出一手。《芬（茝）志》有‘晋武帝之贵妃也’一语，人颇嫵笑，以为伪作。然《荀岳志》亦有‘陪附晋武帝陵道之右’语，似当时不解文字人所为，不足怪也。此碑（按：指《晋辟雍碑》）之出，疑信者参半。”见邓之诚著，邓瑞整理：《骨董琐记全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563页。按：今日不仅绝无怀疑《左茝志》与《晋辟雍碑》者，连历史上曾有对此二刻的怀疑，恐怕也知者不多矣。

音渐渐消失,乃至被主流的观点所淹没。除了《汉代石刻集成》一书提到《张迁碑》被疑为重刻的旧事之外^①,今天流行的各类著作提及《张迁碑》时,对这一段旧案基本上都闭口不谈。

事实上,除了前文提到的顾炎武、林侗、万经等学者之外,就目前已见文献来看,清代至少还有数位学者对此碑提出怀疑。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就提供了两条重要线索。其一为:

方纲奉使江西、广东,往返四过东平,而不得一观是碑。己亥秋,奉使往江宁,归途于十月二日晚发东平,入州学,获观是碑。碑在明伦堂西阶下,砖亭覆焉,顶圆,下无龟趺,中无穿(牛氏《图》:碑之四旁有螭绕之,今砖砌不见)。……在江宁时,汪君庸夫持旧拓残本来,谓今碑是重刻。予以今本对之,实是一石,岂以其无穿疑为重刻乎?必因顾宁人之语傅会为之耳。既得亲见原石,作歌记之。是冬还都,而扬州罗两峰以所藏旧拓本见赠,并为予绘《观碑图》云。^②

翁方纲第一次见到《张迁碑》原石,是在己亥年即乾隆四十四年(1779)十月。他看到的碑石,就是汪庸夫认为是“重刻”的“今碑”。通过今本与旧拓的比对,翁方纲认定二者同出一石,不存在“今碑是重刻”的问题。那么,汪庸夫怀疑“今碑”是重刻究竟有什么根据呢?汪庸夫似乎并没有向翁方纲明确说明,所以,翁方纲只能猜测:“岂以其无穿疑为重刻乎?必因顾宁人之语傅会为之耳。”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:汪庸夫肯定是受到顾炎武的影响,才怀疑今碑为重刻,此其一;此碑无穿,这可能是汪庸夫怀疑其为重刻的根据,此其二。从有关文献著录和各种流传拓本来看,《张迁碑》确实并无碑穿,但众所周知,汉碑有的有碑穿,有的无碑穿,这是关于汉碑形制的常识,《两汉金石记》的作者翁方纲不可能不知道。换句话说,有无碑穿并不能作为判断此碑是否重刻的依据。如果“无穿”可以作为怀疑此碑重刻的证据,那就必须有这样的前提:要么汪庸夫对汉碑形制缺乏常识,乃至无端生疑;要么汪庸夫见过有穿的《张迁碑》,或者他的旧拓所反映的《张迁碑》就是有穿的。可惜由于材料限制,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法深入下去。但无论如何,我们可以由此确认,汪庸夫是认为现存《张迁碑》出于重刻的一位学者。

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又云:

碑云:“治京氏易”,而朱竹垞《经义考·承师门》以欧、赵、洪氏所弗逮,遂不之及也。愚已载入《经义考补正》卷中。

《曝书亭集》卷四十七有《汉荡阴令张迁碑跋》,可以证明朱彝尊看过《张迁碑》。而且,在这篇跋语中,朱彝尊就碑阴题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“碑阴率钱从事二人,守、令三人,督邮一人,故吏三十二人。昔贤谓东汉鲜二名者,是碑范

①[日本]永田英正编:《汉代石刻集成·本文编》,东京:同朋舍,1994年,第260页。

②(清)翁方纲: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,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1辑第10册,第7373页。

巨、范成、韦宣而外，自韦叔珍下皆二名，或书其字然邪？”韦叔珍之类的二名究竟是名还是字，这个质疑是否能够成立，可以暂置不论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朱彝尊对《张迁碑》的态度是有保留的。另一方面，朱彝尊作《经义考》之时，十分注意使用包括汉碑在内的石刻文献材料，书中引证了《刘宽》、《刘熊》、《衡方》等诸多汉碑，卷一百七十一甚至还据《隶释》援引《严訢碑》以考冯君《严氏春秋章句》^①。然而正如翁方纲所指出的，朱彝尊在《经义考·承师门》中却没有引证《张迁碑》中的相关材料。这究竟是什么缘故？难道真的如翁方纲所说，是因为欧阳修、赵明诚、洪适等人没有提及此碑，所以朱彝尊对其真伪有所怀疑？联系到朱氏在碑跋中对此碑提出的若干质疑，我以为，朱氏此举并非偶然疏忽，而是有意为之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对《张迁碑》采取这种有所保留的阙疑态度，是学术上审慎态度的表现。

如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所言，《张迁碑》确实有旧拓本和新拓本的问题。都穆自称得自文徵明家的拓本阙五字，而且没有碑阴和碑额，从年代早晚来看，显然应该属于旧拓本^②。后来，全祖望所见拓本亦没有碑阴，很可能也属于这个旧拓本系列^③。而朱彝尊、卢文弨见到的则是碑阴和碑额俱全的拓本，应属于新拓本。更不同寻常的是，在卢文弨所见拓本中，“都氏所云阙者，今皆可辨”^④。后出的拓本反而比先出的拓本内容更丰富、文字更清晰，这也应该说是匪夷所思的。

除此之外，清代学者王念孙也曾提出《张迁碑》中有后人补刻痕迹的说法，详见下文。在“中国书法江湖”网站上，最近还有人提出《张迁碑》立碑时间上亦有疏忽，其所据乃是清人卢文弨《抱经堂文集》卷十五“汉荡阴令张迁表颂碑跋”：“其记立碑岁月在中平三年，岁在摄提之二月，盖丙寅也。若唐鹿州宝室寺钟铭云：‘大唐贞观三年摄提在岁’云云，案是岁为己丑，次年乃庚寅，而亦云摄提，何也？”^⑤其实，这是一个误会。《汉碑集释》引《尔雅·释天》云：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。”^⑥中平三年岁次丙寅，称“岁在摄提”并没有错。有错的是唐代的钟铭，贞观三年岁在己丑，不应称“摄提在岁”也。

①（清）朱彝尊：《经义考》，中华书局缩印《四部备要》本，第885页。

②研读都穆《金薤琳琅》中的相关题跋，可以明显看出都穆的信古态度，甚至对于当时即有争议的周坛山、峯山刻石拓本，他皆信以为真。误信之外，他的同时代人也已经指出，都穆还有误记之例。《七修类稿》卷十九《辩证类》“南濠误纪”条：“姑苏少卿都南濠穆博学好古，著述满家，一时人物所不及也。……此白璧微瑕，于予有忘年之爱，故为正救之忠臣耳。”

③（清）全祖望：《鲒埼亭集》卷三十七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④（清）卢文弨：《抱经堂文集》卷十五“汉荡阴令张迁表颂碑跋”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⑤《抱经堂文集》卷十五“汉荡阴令张迁表颂碑跋”。

⑥高文：《汉碑集释》（修订本）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500页。

二、汉人的书写态度与汉碑的书刻

关于“爰既且于君”，翁方纲既不同意顾炎武的说法，也不赞成钱大昕的解释，而试图以阙疑求折衷。其说云：

惟碑云“爰暨且于君”，辛楣谓详其文义，言后有兴者且于君也。此说颇似牵强，而顾宁人谓“既且”二字是“暨”之误，因执此以疑碑出摹刻，致兹讹谬。愚按二家之说皆为过当，“爰既且”三字自当阙疑^①。牛真谷云：是碑点画之借、摹刻之讹（此谓当日上石为摹刻，非后来重摹），益足徵古文之简易疏阔，虽善质者不能仿其谬，而好事者乃执以为依托之券验，不亦悖乎？^②

从“善质”、“依托”之语来看，当时确实有人怀疑《张迁碑》是依托之赝品。显然，翁方纲绝不同意这一点，他引证牛运震（真谷）“古文之简易疏阔”来作解释。说古文简易疏阔固然有一定道理，但将误“暨”为“既且”归结为“点画之借、摹刻之讹”，似乎对问题过于轻描淡写，失于简单化。

除了“爰既且于君”，《张迁碑》文中还有其他讹字。对此，诸家解释又各不同。吴玉搢《金石存》卷九云：

“艺于从政”，诸家皆作“从政”，非也。此盖用《鲁论》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”句。“政”字左畔微有损坏，遂与‘政’字疑似，竟释作“政”，于义不通。^③

翁方纲则认为：

此说于文义极通，然恐吴氏所藏本此字纸墨坏耳。今以精拓之本与旧拓本相对，谛审明白，是“政”字，并非“政”字左畔因损而疑似也。然吴氏之说颇有理。以此推之，则是碑撰文之人未必即书石之人，想东汉时能书晋史之类，固不乏人，竟似草稿审视未明，而茫然下笔者。如此则“爰”之为“爰”，“暨”之为“既且”，以及“来”字之类，或皆误笔，未可执一以论矣。^④显然，“政”是“政”之误，否则此句无法索解，这一点翁方纲也不得不承认。但他提出这样一种解释：由于书碑者不是撰文者，所以不了解碑文，“竟似审视未明，而茫然下笔”，窃以为，这种说法同样不能服人。

汉代教育特重小学，自蒙学开始，即强调字体字形的基础训练，不容书写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八十六《金石文字记》提要：“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尝摘其舛误六条，……一曰《后汉荡阴令张迁颂》，炎武误以‘既且’二字合为‘暨’字，……案《张迁碑》拓本‘既且’二字截然不属，炎武诚为武断，然字画分明，而文义终不可解，当从阙疑，《金石文跋尾》所释亦未为至确。”按此提要当出翁方纲所撰，故持论与《两汉金石记》相同也。

②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，第7372页。

③（清）吴玉搢：《金石存》卷九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一辑第九册。

④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，第7372页。按：高文赞同翁说，见《汉碑集释》（修订本），第496页。

有误。至于出仕为官之徒,书写更是必备的技艺。《说文解字序》云:“汉兴,有草书。《尉律》:学僮十七已上始试,讽籀书九千字,乃得为吏。又以八体试之,郡移太史,并课最者,以为尚书史。书或不正,辄举劾之。”^①《尉律》是汉律的篇名,足见讲究书写技艺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要求。故汉代官吏于公文书写尤为敬谨,稍有小错,便可能召来大祸。《汉书》卷四十六《万石君传》云:“(石)建为郎中令,奏事下,建读之,惊恐曰:‘书马者与尾而五,今乃四,不足一,获谴死矣。’其为谨慎,虽他皆如是。”此事众所周知,当然,也许石建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,未必所有人都象他这样谨小慎微。但这个事例表明,汉人对书写是多么谨慎从事。降及东汉时代,这一制度仍然存在,但执行起来已不如西汉严格,以致出现了许慎所说的这样一种现象:“今虽有《尉律》不课,小学不修,莫达其说久矣。”^②尽管如此,东汉时代许多州县长官仍然是从书佐做起,在书写上受过良好训练。《隶释》卷十二《执金吾丞武荣碑》云:

君讳荣,字含和,治《鲁诗经韦君章句》,□横传□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,广学甄微,靡不贯综。久游大学,□然高厉,矗于双匹,学优则仕,为州书佐、郡曹史、主簿、督邮、五官掾功曹,守从事。年卅六,汝南蔡府君察举孝廉。

从现存汉碑文献来看,郡县衙门中都配置了不少书佐,专职从事文件书写之类的事务。例如现存的《北海相景君碑》的碑阴题名中,就有17个门下故吏的身份是书佐^③;而《隶释》卷七《杨统碑》碑阴题名中,也有四人的身份是“故门下书佐”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《华山庙碑》中还有“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”的记载。郭香的身份即是书佐,其职责为“察书”,亦即“察莅它人之书”^④,以免书碑者出错。因此,“能书胥史”“竟似草稿审视未明,而茫然下笔”,只能是翁方纲一厢情愿的推测,在东汉的现实中,是不太可能出现的。

另一方面,从功能上看,《张迁碑》属于去思碑,或称德政碑,但很多人似乎忽略了这一点,例如,《石刻题跋索引》将《张迁碑》划归“墓碑”一类,秦公也称《张迁碑》的“碑文内容是一篇辞藻华丽的‘谀墓’文章”^⑤。严格地说,这是不恰当的。这也说明,人们对《张迁碑》作为德政碑的性质和特点还没有足够深刻的认识。需要强调的是,德政碑的撰文书刻都是一种公共行为^⑥,这一点

①许慎:《说文解字》,中华书局影印本,1979年,第315页。

②《说文解字》,第315页。

③《汉碑集释》(修订本),第63-64页。

④《隶释》卷二《西岳华山庙碑》,第26页。按:欧阳修认为应作郭香察“书”,而洪适则东汉人例为单名,故应作郭香“察书”。自是以降,各家或是欧,或是洪,争论纷纭。笔者同意洪适之说。

⑤秦公:《明拓本〈张迁碑〉》,《文物》1983年第9期。

⑥关于汉碑的公共性,拙撰《从碑石、碑颂、碑传到碑文——汉唐之间碑文体演变之大趋势》所论较详,可参阅。文载《唐研究》第13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7年。

从碑阴所附 41 个人名即可获得证明,绝不可能率尔为之。况且,立碑之时,张迁尚在世,很有可能还在现场;即使他当时不在场,事后也有可能看到这件碑刻;即使他本人看不到这件碑刻,那 41 位为立碑出钱出力并在碑阴留名的门生故吏也总会看到这件碑刻。前文已经说过,“爱暨”二字是东汉人的习语,司空见惯,绝不是生僻之词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怎么可能让“爱既且”这样割裂字体的严重错误发生,退一步说,即使某位“能书胥史”疏忽写错了,其他人又怎么可能对这样的错误熟视无睹、听之任之?

三、补刻与翻刻问题

已有学者指出,“目前,社会上仍流传着许多《张迁碑》拓片,多属翻刻,虽字迹清晰,但与原拓大相径庭。至于影印《张迁碑》字帖及商店所售该碑拓片等,对于未见此碑者,只好信以为真。”^①这些翻刻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难以究诘,但恐怕很早就开始了。笔者孤陋寡闻,没有见过《张迁碑》拓片原件,只看到影印本或电子本,但居然也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。

翁方纲是见过《张迁碑》原石的,而且早在乾隆年间。据他描述,“碑额二行,居碑文第八行至第十三行之间,盖碑文偏右,而空其左也。”^②据查国家图书馆网站“碑帖菁华”电子数据库,国家图书馆所收《张迁碑》拓片为清乾隆、嘉庆年间拓本,黄易旧藏,其碑额位置与翁方纲所描述者正同。翁方纲当日所见碑,现今收藏在山东泰安岱庙历代碑刻陈列室中,据在网上看到的电子照片,其碑额位置亦与翁方纲描述相同。但是,笔者注意到:《汉代石刻集成》中所收“篆额及碑首之形状”之参考图^③,两行篆额位于碑文第六行至第十一行之间。与翁方纲所见本相比,这个拓片篆额位置正好右移了两行,也就是说,篆额左右两边的碑文正好各五行(左边计入第十三行与第十四行之间的空行),若仅就刻有碑文部分而论,其位置正好居于中间^④。翁方纲谓“碑文偏右,而空其左”,从现存碑石电子图来看,左边确实留出空白,大约有两三行空间,则位于碑文第八行至第十三行之上的篆额,其位置正在整个碑石的中间。简言之,两种篆额的位置都可以说是居中,但一种居于刻有碑文的版面中间(不计碑石左边的空白版面),另一种则居于整块碑石的中间(计入碑石左边的空白版面)。接下来就有一系列问题:究竟何者为真?如果翁方纲所见本(亦即岱庙碑石)是原刻的,当时排字布局时为什么要空出左边的位置?如果《汉代石刻集成》

①吴绪伦:《〈张迁碑〉初探》,《泰安师专学报》1996年第3期。

②《两汉金石记》,卷十二,第7371页。

③永田英正编:《汉代石刻集成·图版释文篇》,东京:同朋舍,1994年,第252页。

④据《汉代石刻集成·图版释文篇》,汉碑篆额大多位置居中,其左右两侧碑文行数亦往相等,如《北海相景君碑》(第89页)、《三公山神碑》(第97页)、《芈他君石祠堂题记》、《西岳华山庙碑》(第154页)、《鲜于璜碑》(第157页)、《赵宽碑》(第227页)及《圉令赵君碑》(第257页)等。

所收拓片是翻刻的,为什么不依照原刻而擅自移动篆额位置?难道翻刻者所据的拓片篆额与碑文并不连在一起吗?既然有心翻刻作伪,为什么不准确地了解原碑各部分的尺寸细节?考虑到这两种拓片篆额位置不同,再联系最初提到《张迁碑》的明代都穆等人皆未提及篆额,有没有可能这两者都是翻刻?有没有这种可能:原碑没有篆额,而翻刻者为了取信于人,根据汉碑一般惯例,再依据自身对张迁生平的理解,擅自加上篆额,结果不仅使篆额字体奇特,又使其题衔有违汉碑一般义例?

据《汉代石刻集成·图版释文篇》所附《图版一览》,此书所收《张迁碑》拓本乃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拓本,而参考图则来自《山东秦汉碑刻》第32页^①。可以理解,参考图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碑额与碑文的位置关系而特设的,但为什么不径用京都大学所藏拓本为图呢?莫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《张迁碑》拓本也没有碑额不成?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网页上查找其所收藏的《张迁碑》拓本(电子本),也只有碑阳和碑阴两种,并无碑额。辗转通过友人查询京都大学的实际收藏,也确认没有《张迁碑》的碑额。

与翻刻问题相关的还有另外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碑文第十三行与第十四行之间有一空行,乍一看颇为突兀。第二个问题是“其正文第十四行末,‘刊石立表’句‘表’字之旁,又刻‘衣’字。邵阳褚峻千峰云:尝见旧拓本无此,牛氏图据此说,以谓此半表字殆后人所刻。方纲按:此半字实是原石所有,褚氏、牛氏之说非也。”^②第三个是“其碑阴下列无字处之末尾,有楷书‘付迄’二字,此由后人妄凿,非原碑也。”^③这三个问题其实不无关联。第一个问题初看似乎甚不可解,然而细考汉碑书刻布局,并不奇怪。原来,很多汉碑在正文之末还系上一两行题记,正文与题记之间往往空一行,如《鲜于璜碑》、《白石神君碑》^④,甚至空两行,如《芈他君石祠堂题记》^⑤。碑文第十四行末所刻的那个字,未必如翁方纲所说是个“表”字,有人认为当是“表”字的下半部分,可能是刻工添补凿改之笔。张彦生就持这样一种看法:“十五行末表字写俗,旁写表字下半衣正之,汉杨淮表碑,表字下写作衣。”^⑥张彦生所谓“十五行”,就是翁方纲所说的“十四行”,因为计入空行,故与翁方纲有一行之差。其实,《汉杨淮表碑》中的“表”字写法亦见于《张迁碑》的碑额,也就是说,《张迁碑》正文中“表”字写法与碑额不同。如果以碑额写法为正体,那么,碑文的写法就是“写俗”了。第十五行刻完之后,这个错误才被发现,于是有人就在这个

①山东省文物总店编:《山东秦汉碑刻》,齐鲁书社,1984年。

②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,第7371页。

③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,第7371页。《汉代石刻集成·图版释文篇》第255页所印碑阴拓本未见此二字。

④《汉代石刻集成·图版释文篇》,第157页、第239页。

⑤《汉代石刻集成·图版释文篇》,第119页。

⑥张彦生:《善本碑帖录》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34页。

“表”字右边空行处补刻“表”下半部“衣”。至于补刻者为何人,也可以有两种解释:一是刻碑工匠发现之后补刻,这种可能性很大;一是其他好事者补刻,这种可能性很小。其中的原因正如张彦生所说:“由于该碑拓本有经济价值,故有人做伪得利,或为了流传再刻传世(如翁同龢刻本)。因有翻刻本,故伪本易辨。”^①翻刻本、伪本甚多,安知今存山东岱庙的不是其中之一?至于碑阴末尾楷书“付迄”二字,则更不可解,翁方纲也认定这是“由后人妄凿”,不是原碑上应有的镌刻内容。那么,“付迄”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?其中暗藏了关于此碑身世来历的哪些重要信息?是否意味着其中有一场交易?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
碑刻正文中还有后人出于补刻的证据。碑文第二行云:“高帝龙兴,有张良,善用筹策,在帷幕之内,决胜负千里之外,析珪于留。”清王念孙《汉隶拾遗》“《荡阴令张迁颂》”条:

第二行“在帷幕之内”,“幕”字盖本作“莫”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传》:“市租皆输入莫府。”《冯唐传》:“上功莫府。”(以下二传《汉书》同^②)《李将军传》:“莫府省约文书籍事。”《后汉书·吴汉传》:“莫府上兵幕。”皆以“莫”为“幕”。《史记》索隐引崔浩云:“古者出征为将帅,军还则罢,治无常处,以幕帟为府署,故曰莫府。”是汉时帷幕字通作莫也。今碑文作“幕”,“巾”字甚小,局促于“莫”字之下,不成字体,盖后人补刻也(碑中字上下相距,自有定式,今于“莫”下加“巾”字,则字形太长,致与下字迫近,比之诸字,疏密悬殊矣)。而《金薤琳琅》已作“幕”,则明时碑文已然矣。^③

高文先生认为:“‘帷幕’字《史》、《汉》通作‘莫’,然‘幕’字亦经传之所常见。王念孙《汉隶拾遗》谓‘巾’字甚小,盖后人补刻,殆不然也。”^④笔者则认为王念孙观察敏锐,其言可信。检索《史记》及两《汉书》,确实如高文先生所言,“帷幕”、“幕府”大多作“莫”,但也不是没有作“幕”的^⑤。更有价值的例证见《隶释》卷十七《吉成侯州辅碑》:“遭孝质无嗣,乃定册帷幕,愍立圣主,有安社稷之勋。”^⑥在这个例句中,“幕”的语境与《张迁碑》相同,说明“帷幕”、“帷莫”两种写法对东汉人来说都不算错。然而,覆按《张迁碑》拓本,确实“幕”字上半“莫”甚大,而下半“巾”很小,字形结构上严重失衡,显然不是

①张彦生:《善本碑帖录》,第34页。

②比对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此处“以下二传”当指《冯唐传》和《李将军传》。

③(清)王念孙:《汉隶拾遗》,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3辑第2册,第604页。

④《汉碑集释》(修订本),第493页。

⑤“莫府”的写法在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中共出现27次。“幕府”一词在《汉书》出现1次(卷九十八《元后传》,第4027页),在《后汉书》出现12次,这还没有排除其中某些可能是后人回改“莫”为“幕”的例子。

⑥《隶释》,第178页。

一次刻成,而是先刻为“莫”,再补刻“巾”。其所以如此,乃是因为刻者先照原碑刻成“莫”字,继而因为不熟悉汉人的用字习惯,觉得“帷莫”有误,“莫”应改为“幕”,遂于字底补刻“巾”。王念孙说:“《金薤琳琅》已作‘幕’,则明时碑文已然矣”,文物出版社1983年缩印明初拓本《张迁碑》亦作“幕”,可以证明王说不错。那么,这个补刻至迟应是明代人所为。

四、碑文文本的问题

如果确认今存《张迁碑》不是汉人原刻,而是后人之重刻或翻刻,只是有所补改而已,那就等于承认碑文文本出自汉人,仍属可信,文本中所存在的诸多词语典实之误仍然没有办法解释。

关于《张迁碑》叙张释之事有误,《七修类稿》卷二十《辩证类》“汉唐事讹”条云:

《汉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碑》载,文帝游上林,问禽兽所有,令不对,更问畜夫,畜夫事对,于是进畜夫为令,令退为畜夫,与今史文迥异。又《唐白敏中碑》云:会昌中,德裕起刑狱,五宰相窜岭外,公承是一年,冤者皆复位,与史云白因李进后乃抵之,善恶不同如此。予以前当依碑,盖公事也,史或讹;后当依史,私碑也,或有谗。^①

郎瑛关于《白敏中碑》的看法暂置不论,他对《张迁碑》的这个说法实在有点匪夷所思。确实,立《张迁碑》可以说是“公事”,但是,这是一件后汉时代的“公事”,比前汉时代的《史记》晚了几百年,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怀疑当代人司马迁的记载,而相信后代人的转述。郎瑛这个判断,只能说是为回护《张迁碑》而曲为之说。

关于“晋阳珮玮,西门带弦”的用典错误,有人或许会以“颠倒用事”来解释。在古代尤其是唐宋以后的诗文创作中,为了调谐平仄以取得悦耳动听的声韵效果,或者为了追求错综奇崛的修辞效果,往往颠倒用词甚至颠倒用事。李详《愧生丛录》卷四云:“《唐庞德威墓志铭》:‘勇若专诸,捷若庆忌。’用左思《吴都赋》,而专诸、庆忌互易。”^②按《文选》卷五《吴都赋》原文云:“捷若庆忌,勇若专诸。”《唐庞德威墓志铭》只是调整前后两句的顺序,并未对其意义有任何改变。严格地说,这还不能算是颠倒用词或用典。《茶香室丛钞·四钞》卷十二“颠倒用事”条:

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云:李湜撰《东林寺舍利塔碑》曰:“庞统以才高位下,遂滞题舆;陈蕃以德峻名沉,初膺展骥。”展骥是庞统事,题舆是陈蕃事,而倒用如此,得非误乎?愚谓此或有意错综其辞。^③

①(明)郎瑛:《七修类稿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1年,第209页。

②李详:《愧生丛录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第61页。

③(清)俞樾撰,贞凡、顾馨、徐敏霞点校:《茶香室丛钞》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1670页。

在这篇碑文中,李滉为什么要“颠倒用事”,除了俞樾所说的“有意错综其辞”外,很有可能是为了追求骈句前后平仄对称。这四句可以看作扇对,其句尾平仄构成是仄、平、平、仄,符合骈文的惯例。如果写作“庞统以才高位下,遂滞展骥;陈蕃以德峻名沉,初膺题舆”,不仅句与句之间平仄不谐,而且一句之中前后平仄亦不谐调(“滞”、“骥”都是仄声,而“膺”、“舆”都是平声)。在《张迁碑》的时代,还没有这么严格的平仄格式,“晋阳珮玮,西门带弦”也不存在为调谐平仄而颠倒用事的用意与可能。

除了笔者在《读〈张迁碑〉志疑》中已经考证的《张迁碑》用词用典的多处谬误之外,碑文中还有若干不合常格之处。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《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》提出其不合常格者三处:

碑合表颂仅五百言,而其叙张氏先世事乃至三之一,亦似太烦。此固不可以入潘昂霄、王止仲之例者矣。颂文无“颂曰”字,而碑尾纪年月后又若颂词者,则是文与书皆不可以常格论尔。^①

汉碑颂辞,多以“颂曰”、“辞曰”之类的语词引起,而《张迁碑》却没有;碑文末尾题记年月的两行,句式又相当整齐,貌似铭词;这两处确实都不合碑文常规格式,也许我们可以视为例外。此外还有一处则有关碑文之写作。准确地说,碑文合表颂共有13行,合计513字,篇末“惟中平三年”以下两行题记共64字不计在内。其中叙述张氏先世的文字占了4行多,共计186字,超过三分之一,确实“太烦”。但若与其他汉碑相比,这一点还算不上特别不合常格,也并非没有先例。立于光和三年(180)、年代与《张迁碑》相近的《赵宽碑》,其碑文合表颂在内共22行,其中叙述赵氏先世的文字达8行以上,占三分之一强^②。因此,与其说《张迁碑》叙述张氏先世字数之多不合常格,不如说其叙述方式与内容不合常格。在叙述方式方面,碑文居然长篇叙述张释之事,颇为可怪;更可怪的则是其所叙内容亦不合史实。这一点笔者在前面那篇文章中已经讲明,此不赘。这里提出另外一点来加以讨论。

碑文云:“周公东征,西人怨思。奚斯赞鲁,考父颂殷。前喆遗芳,有功不书,后无述焉。于是刊石竖表,铭勒万载。三代以来,虽远犹近。诗云旧国,其命惟新。”以下所接即为二十句四言铭辞。清俞樾《汉碑四十一条》认为此处有错简,其说云:

上文既云“于是刊石竖表,铭勒万载”,便可径接铭词,乃又缀此四句,殊为不伦。窃疑此四句当在“前喆遗芳”之下,其文本云:“奚斯赞鲁,考父颂殷。前喆遗芳,三代以来,虽远犹近。诗云旧国,其命惟新。有功不书,后无述焉。于是刊石竖表,铭勒万载。”盖引奚斯、考父二事,而续以此四语,以见鲁殷二国,有二子为之赞颂,故功烈常存,虽远如近,国虽旧而

①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,第7372页。

②《汉代石刻集成·图版释文篇》,第226-227页。

命则新也。若有功不书，则后无述矣。此碑错讹不一，顾氏《金石文字记》因“爱暨于君”误作“爱既且于君”，疑好事者得古本而重刻之。……今按此四句之前后错置，其缪更甚，前人未经论及，故表出之。疑作书者，遗夺于前，而补缀于后。吴氏颖芳作《散氏铜盘铭释文》曰：“古人质朴，文中有遗佚，或补于尾，孙皓《天玺碑》犹踵为之。”此言也，即可以说此碑矣。

这里涉及三个问题需要讨论：首先，此处文字是否错简；其次，如果是错简，原因何在？第三，正确顺序又是如何？

第一个问题似乎比较容易回答。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俞樾的看法，毕竟“铭勒万载”以下缀接出来的四句，实在不合文理，“殊为不伦”。但是，俞樾重构的文句顺序，仔细体味起来，亦不甚顺畅，至少“前喆遗芳”一句的位置就值得商榷。笔者以为，这里恐怕未必是错简的问题，而可能是行款格式的问题。“三代以上，虽远犹近。诗云旧国，其命惟新”中的后两句，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，原文是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”。无论把这首诗理解为祭祀周文王的颂歌，还是如旧说理解为周公戒成王之诗，插在这里都显得突兀，即使放在别的地方，也一样不恰当。所谓“旧国”、“惟新”之句，用在张迁身上非但比拟不伦，简直不知从何说起，用来指张氏家族，也显得过分托大而不知轻重。难怪清人周寿昌说：“此何等辞，亦太无忌讳矣。”^①但如果不论文意，只论文气，似乎将其视为铭辞更合理一些。那么，所谓“虽远犹近”、所谓“旧国”、“惟新”就变成指张氏家族人才辈出，世胄绵长。也就是说，这四句应该排在下行，为铭辞的开头。乍一看，这四句很象铭文开头的“冒头”。明人王世贞论四言宴会酬赠诗每有所谓“冒头”，从远处大处讲起，若干句后才切入正题^②。其实，不仅这类体式的诗作，其他礼仪性文字包括汉碑也是如此，为了达到庄严堂皇的效果，开头一段往往以大帽子领起，有如礼仪场合的峨冠博带。碑文毕竟是一种礼仪文字，铭文的礼仪性赞颂功能尤其突出，德政碑铭文中更不乏其例。例如《刘熊碑》铭文开头即云：“清和穆铄，实惟乾坤。惟岳降灵，笃生我君”，前两句就是“冒头”。与《刘熊碑》相比，《张迁碑》牵扯“旧国”“惟新”之类，不但是过度的自夸虚饰，用典也显得不伦不类，可以说是冒头过于迂远阔大了。

最后讨论《张迁碑》出现的“八基”一词。碑文云：“流化八基，迁荡阴令。”“八基”二字，一般皆释为“八年”。最详尽的解释见清吴玉搢撰《别雅》卷一“基月基年期月期年也”条：

《汉任伯嗣碑》：“基月有成。”《费凤别碑》：“基月而致道。”《灵台碑》：“承祠基年。”皆以“基”为“期”。按《周礼·地官·质人》：“邦国期。”释文云：“‘期’本或作‘基’，《后汉书·郎顗传》：‘于诗三基。’注：‘‘基’当作‘期’。’”《柳敏碑》：“传于万基。”《张迁碑》：“流化八基。”

①（清）周寿昌撰，许逸民点校：《思益堂日札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48页。

②（明）王世贞：《艺苑卮言》卷三，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本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994-995页。

“基”皆同“期”。“期”“基”二字古盖通用也。

以《汉碑集释》和《汉代石刻集成》为代表^①，大多数人解读《张迁碑》皆承用此说。但实际上，如此理解，既不合汉代官制，在前后的历史文献中也找不到相似的用例。清李光暎《金石文考略》卷二《荡阴令张迁碑》引《金石评考》：“八基者，谓子贱以下八事。”所谓“八事”，具体地说，就是指碑文中“子贱孔蔑，其道区别。《尚书》五教，君崇其宽；《诗》云恺悌，君隆其恩；东里润色，君垂其仁。邵伯分陕，君懿于棠。晋阳珮玮，西门带弦，君其体素，能双其勋”诸句。如果认真计算起来，这几句所述只有六事，很难凑满“八事”。即使勉强算作“八事”，其中“君懿于棠”一句，将“甘棠”简化为“棠”，似乎也是自我作古，不足为训。何况汉制一任三年，汉碑中又常有“三祀有成”的说法，“流化八基”要么有别的解释，如果解作“八年”，恐怕不甚妥当。

五、小结

在《读〈张迁碑〉志疑》中，我曾推论《张迁碑》如果是伪作，则有可能出于明人之手。明人伪造石刻以牟利的例证并不鲜见，《七修类稿》卷四十四“夏池碑”条就是一例：

成化间，吾杭棘卿夏某阴谋深险，邻有园池颇胜，心窃欲之，乃自撰文为断碑，密沉于池。久之，争诉于官，夏谓某年余家有碑以纪庭馆之胜，中世荒芜，此碑已落于池中，亦可验也。竭池得碑，读之俨然夏氏物也，卒归之，邻竟坐诬罔。夫身富贵而设法犹是，贫贱得不为盗也耶？^②

万历时代，李日华在其《味水轩日记》中也多次提到当时江南苏州、嘉兴等地书画碑帖作伪风气之盛^③。可见，在明代，伪造碑帖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，当然，《张迁碑》是不是明人伪造目前还很难下结论，毕竟没有直接的证据。清人提到其或出三国魏人翻刻旧碑的可能性也还没有完全排除。秦公先生指出，“其中一些字的结体取态，与魏晋真书相近；一些字的恣肆气韵，又与吴《谷郎碑》相似而雍容过之。”^④对这种书体如何认识，如何定性，亦即如何确认《张迁碑》的书法风格及其所属时代，这些问题有待作进一步深入讨论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

①《汉碑集释》，第499页；《汉代石刻集成·本文篇》，第263页。

②《七修类稿》，第460页。

③（明）李日华撰，屠友祥校注：《味水轩日记》，远东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④秦公：《明拓本〈张迁碑〉》，《文物》1983年第9期。